

國際育兒支持政策經驗與啟示

黃淑婷 |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視察

壹、前言

鑒於生育率是延緩人口結構變遷速度之重要關鍵，更攸關一國之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全等，許多已開發國家相當重視少子女化議題，積極且長期推動因應少子女化對策，如：OECD 國家投注在家庭津貼、照顧服務及稅務抵扣等措施所占 GDP 比重，已由 2007 年的 2.2% 上升到 2011 年的 2.55% [9]，大部分國家的總生育率也轉呈上升的態勢。這些國家究竟以何種良帖，讓人民願意生；又有什麼樣的措施，讓人民養得起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

本文將就 OECD 國家中，歐洲生育率相對較高且穩定的法國、生育率與女性就業率均高的瑞典，以及與我國發生少子女化原因類似且 2000 年以前總生育相當的鄰近日本與南韓等亞洲國家，其總生育率變化情形及因應少子女化措施重點說明，俾供我國提升生育率政策規劃之參考。

貳、總生育率大幅下降

首先觀察法國、瑞典、日本及南韓 2006 年至 2015 年這 4 個國家個別總生育率變化與 OECD 平均總生育率情形(詳圖 1)，可發現法國與瑞典生育率相對穩定，均高於 OECD 平均總生育率，已相當接近人口替代水準 2.1 人；日本與南韓則低於 OECD 平均總生育率，距離人口替代水準仍有改善空間，其中南韓之生育率變化為四個國家中最低且最不穩定的。

在公共支付家庭相關政策措施經費占 GDP 比率部分，法國於每一面向之比率均高於 OECD 平均，惟現金補助之占比仍為最高；瑞典除無提供育兒家庭相關稅務抵扣外，在育兒服務措施支出之占比，均較法國、日本及南韓為高；日本之每一面向占比均低於 OECD 平均，以現金補助之占比為最高；南韓相關政策支出之占比亦均低於 OECD 平均，惟以服務措施之占比為第一，惟即便合計現金補助與家庭稅務抵扣之占比，仍未及服務措施項目之一半。[10]

綜合觀之，由於稅務抵扣能提高家庭可支配所得，故現金補助及稅務抵扣均屬經濟支持政策，而法國與日本均以提供育兒家庭經濟支持為主，瑞典與南韓則提供教保服務措施為政策主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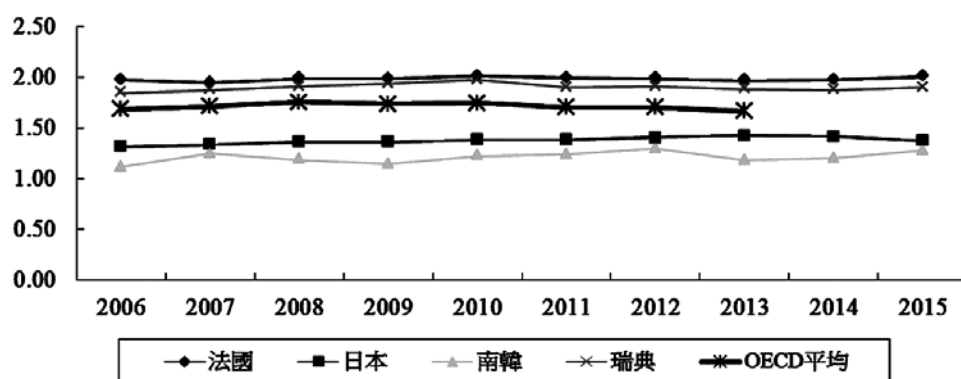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2006-2015 年法國、日本、南韓、瑞典總生育率變化情形

資料來源：OECD Data，取自 <https://data.oecd.org/pop/fertility-rates.htm>；2014-2015 年取自國家發展委員會「中華民國人口推估(105 年至 150 年)」報告。

表 1 2011 年主要國家公共支付家庭相關政策措施經費占 GDP 比率

| 國家 | 現金補助 | 服務措施 | 家庭稅務抵扣 | 合計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法國 | 1.57 | 1.36 | 0.68 | 3.61 |
| 瑞典 | 1.49 | 2.14 | 0.00 | 3.64 |
| 日本 | 0.88 | 0.47 | 0.38 | 1.74 |
| 南韓 | 0.05 | 0.89 | 0.22 | 1.16 |
| OECD33 國平均 | 1.35 | 0.95 | 0.25 | 2.55 |

資料來源：OECD Family database，取自 <http://www.oecd.org/social/family/database.htm>

參、主要國家個別生育率情形及政策現況

一、法國

(一)總生育率變化情形^[10]

1946 年至 1965 年間，法國因受戰後高生育率及大量移入人口的影響，人口成長率每年平均高達 9.4‰，尤以 1960~1965 年間平均成長率達 13.0‰為最高；惟自 1965 年起總生育率開始下降，1975 年低於人口替代水準後，呈現減少的情形，經過約 20 年，1996 年後，總生育率持續增加，迄今一直維持高於 OECD 平均總生育率的水準(詳圖 2)。

依據國民健康署資料指出我國 102 年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 32.0 歲、29.7 歲；分析 102 年之生育情形，其中生母初胎年齡為 30~34 歲者高達 40.4%，35~39 歲為 13.5%，遲育趨勢相當明顯，也造成國人生育年齡越來越晚，內政部統計，國內婦女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，101 年就超過 30 歲，去年提高到 30.6 歲，甚至有高達 17.8%的女性是 35 歲以上才生第一胎，本市育齡婦女主要生育年齡亦於 100 年起由未滿 30 歲遞延至 30 歲以上，因此，本市生育第一胎平均生母年齡也自 100 年起進入 30 歲門檻；本市 104 年第一胎平均生母年齡為 30.7 歲，次於臺北市 32.4 歲、新北市 31.1 歲，居六都第三且高於全國平均的 30.6 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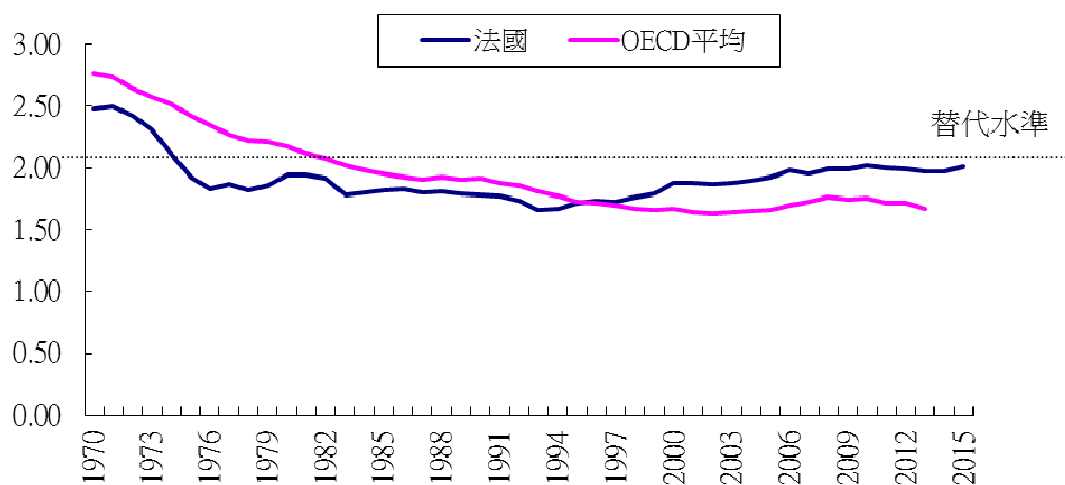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1970-2015 年法國總生育率變化情形

資料來源：同圖 1。

法國能維持高生育率之主要因素是成功的家庭政策，托育服務及學齡前教育是法國家庭政策的重要組成，提供多元托育選項，讓所有家庭都能兼顧工作及育兒。由於有足夠的托育支持系統，讓婦女有更多選擇權，可以選擇要不要生育、何時有小孩、在家照顧小孩或繼續工作，因此，法國 25 歲至 49 歲婦女就業率超過 8 成，高於其他 OECD 國家平均的 71%。另外，法國政府也對育兒家庭提供育兒津貼、減輕所得稅負等優惠，以提高育兒家庭的可支配所得。

(二)具體育兒支持政策及措施^{[1][2][3]}

1. 友善職場政策

- (1)產假：提供全薪產假，並依扶養子女數給予不同期間的假期。第一胎 16 週、第二胎以上增加至 26 週，雙胞胎及三胞胎則分別可請 34 週及 46 週。
- (2)照顧假：提供全薪照顧假，於生產後 4 個月內，可申請連續 11 天的假期。
- (3)多元的工作型態：父母若決定離開職場照顧幼兒，在未領取其他相關幼童托育補助的條件下，每個家庭每月可領 501.59 歐元(約新台幣 17,936 元)的育兒補助金；若已領取其他補助專案者，則為 339.94 歐元(約新台幣 12,156 元)的家庭照顧補助。

2. 教保環境政策

- (1)確保保母照顧品質：強制規定兒童照顧者訓練時間，並須與父母簽訂聘僱契約，有 4 個以上小孩之家庭，可選擇經審核的保母至家中照顧。
- (2)增建 3 歲以下兒童的照顧中心：預計在 2017 年前，再新建 275,000 間兒童照顧中心，並優先提供經費及資源給貧窮的地區。
- (3)完善幼兒托育：由中央政府出資管理，免費提供 2 至 6 歲小孩每天 8 小時的托育。對於另有需求的父母，可自行付費來獲得課前、課後、或假日期間的額外服務。

3. 經濟支持政策

(1)設立家庭津貼基金

提供家庭多元的經濟救助方案，此基金以「每月家庭津貼基準」(monthly family benefit base)計算大部分項目的補助金額；家庭津貼基金之金額則隨消費物價指數變動逐年調整，2014 年 4 月 1 日起為 406.21 歐

元(約新台幣 14,526 元)。

當婦女懷孕第 7 個月起或領養 20 歲以下的子女時，根據家庭經濟狀況領取最高 927.71 歐元(生產)(約新台幣 33,175 元)或 1,855.42 歐元(領養)(約新台幣 66,350 元)之津貼。

提供扶養 2 個子女的家庭，每月領取約 129.99 歐元(約新台幣 4,648 元)之育兒津貼。若是 3 個以上介於 3 至 21 歲子女的家庭，而父母僅有單份收入且年收入低於 37,295 歐元者，可領取約 169.19 歐元(約新台幣 6,050 元)。

嬰兒 2 個月大後(或父母產假結束)至 3 歲以下使用托育服務者，可依家庭經濟狀況領取 162 至 378 歐元(約新台幣 5,793 元至 13,517 元)之托育津貼。

(2)教育津貼：提供 6 至 18 歲在學子女，每月可領將近新台幣 1 萬元津貼。

(3)稅賦減免：以家庭為課稅單位，對於兒童照顧給予相關的租稅扣抵。2004 年起，附設托兒所的企業可退稅，且 7 歲以下兒童的托育費用可以減稅。

二、瑞典

(一)總生育率變化情形[10]

19 世紀因死亡率降低，人口不到 60 年內增加 1 倍[3]。1928 年開始，生育率低於 2.1 人的替換水準以下，二次戰後嬰兒潮，生育率回升，然於 1968 年、1989 年和 1992 年又出現低於 2.1 人的生育率，1992 年後一路下滑至 1999 年的 1.49 人之歷史新低。然而，1968 年至 1987 年瑞典總生育率雖低於 OECD 平均總生育率，但經過 20 年後，1988 年至 1995 年維持高於 OECD 平均總生育率的成績[1]。2002 年迄今，瑞典生育率又出現回升現象，均高於 OECD 平均總生育率，預估未來可維持在 1.9 人左右[8]。

經瑞典政府之努力，總生育率於 2002 年後能維持高於 OECD 平均之原因，在於瑞典政府成功整合家庭、勞動與性別政策。瑞典創立現代的家庭政策，以保障婦女個人權利與兩性間之平等，並將家庭支出轉移到國家，強調照顧兒童是國家責任。因此，早在 1974 年起即導入父母假以取代育嬰假，對婦女在就業市場的勞動轉型有極大助益；另包括帶薪育兒假的父母保險制

度及公共托育制度，1980 年代擴大親職假範圍，並創立「促生速度獎金(speed premium)」，鼓勵與縮短婦女再生第 2 胎之間隔等，使得瑞典之總生育率在 1989 年至 1992 年，回升到 2 個小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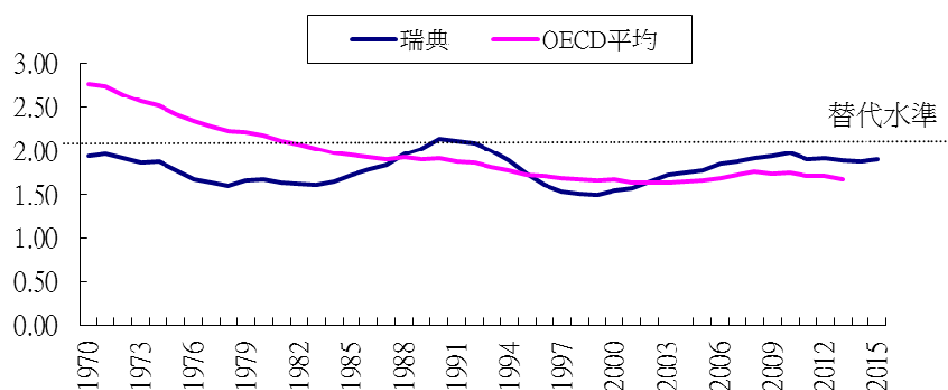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 1970-2015 年瑞典總生育率變化情形

資料來源：同圖 1。

(二)具體育兒支持政策及措施[1][2][3]

1. 友善職場政策

(1)育嬰假及津貼：自生育或領養子女日起，可享 480 天育嬰假，由父母雙方各享最高 240 天，其中各有 1 個月分別為父、母保留的，假設該方決定不申請，亦不能轉由另一方使用。父母任何一方都可在孩子 8 歲之前自由選擇休全職、半職及四分之一的育嬰假。此外，480 天中，近 390 天可領取原薪水 80%。

(2)彈性工時及補助：提供給 12 歲以下子女的父母，照顧每位子女每年最高為 120 天之短期育兒假，並可請領 80%薪水。

2. 教保環境政策

(1)優質平價的托育服務：設置品質好、價位低且公共化及社區化的學前教育與托育，以供育有 6 歲以下幼兒之家庭使用。

(2)友善兒童的公共環境：規劃許多家庭友善公共區域，如大部分的購物中心及圖書館皆有嬰兒的哺乳室及尿布台，圖書館亦規劃嬰兒車停放區，餐廳則提供高腳的兒童椅。

3. 經濟支持政策

- (1)家庭津貼：給付未滿 17 歲的所有兒童，每位每月可獲得 750 克郎（約新台幣 2,800 元）或每年 9,000 克郎（約新台幣 33,000 元）的家庭津貼，領取家庭津貼的金額，則依兒童出生排行而有所差異。
- (2)親職津貼：孩童出生後 9 個月內，父或母可領取 6 個月的一般性親職津貼；孩童 8 歲前，則可領取 6 個月的臨時照顧津貼。津貼額度的部分，前 9 個月給予投保薪資的 90%，其餘 3 個月份為最低保證額度每日 60 克郎（約新台幣 200 元）。
- (3)兒童津貼：16 歲以下的兒童，每人每月 1,050 克郎（約新台幣 3,990 元），為父母分擔照顧子女的開銷。
- (4)免費的教育及健康照顧服務：6 歲至 19 歲的教育及學校午餐皆為免費，而 20 歲前的子女健康照顧費用全由政府負擔。

三、日本

(一)總生育率變化情形^[10]

日本總生育率於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初期大致維持在人口替代水準，1974 年總生育率跌破 2.1 人後，即呈下降情形，直至 1989 年降為 1.57 人，日本政府感受人口變化所帶來的危機，成立跨部會單位，開始思考如何建構讓國民兼顧工作與生育子女的環境與條件，以提升生育率。然而，2005 年總生育率仍創下歷史新低 1.26 人，幸而 2006 年後生育率有逐漸提升趨勢^[4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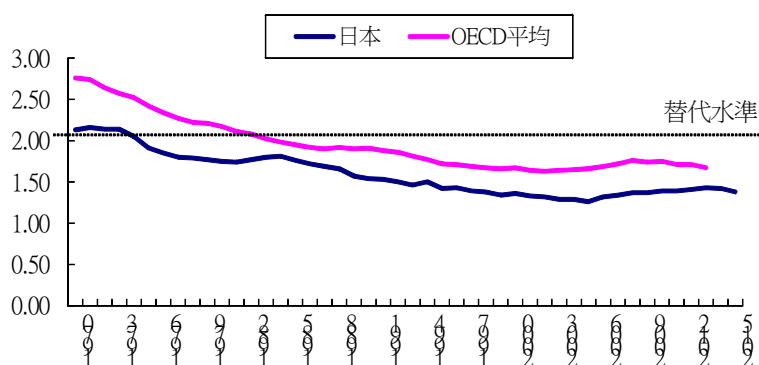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1970-2015 年日本總生育率變化情形

資料來源：同圖 1。

1980 年代前，日本透過家庭計畫抑制生育率。1989 年社會形成少子化對策意識後，1991 年制定的「育兒休業法」為解決少子化之起步，並陸續推動「天使計畫(1994-1999)」與「新天使計畫(2000-2004)」。

接著，2003 年通過「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」、2004 年通過「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」及「少子化社會白皮書」，並制定相關法令或計畫，如 2005 年「新新天使計畫¹(2005-2009)」與 2006 年「新少子化對策」等，除 2005 年跌至 1.26 人外，日本的生育率均維持在 1.3 人以上。[5]

(二)具體育兒支持政策及措施[1][2][5]

1. 友善職場政策

- (1)產假及津貼：孕婦可享有產前 6 週、產後 8 週，共 14 週的產假，而被保險人領有基本日薪 60%。
- (2)育嬰假及津貼：於子女滿 1 歲之前，可請 1 年育嬰假；於小孩 3 歲前，父母雙方皆可彈性的申請長時間的育嬰假，並提供工資補助率為 50%，最初半年期甚至可提高至 67%。
- (3)多元工作型態：2012 年起，有未滿 3 歲兒童的勞動者，企業主有義務實施縮短工作時間制度，男、女性為照顧幼兒，可選擇兼職、隔日上班或申請縮短工時。女性懷孕後，可在家遠距工作。
- (4)設置企托及補助：法令規定 101 至 300 人的企業或醫院，有義務設置員工的保育所，且由厚生勞動省補助建築物的改建費用及半數的營運費。

2. 教保環境政策

- (1)提高保育措施的質與量：設置保育室，以收托 2 個月以上、3 歲以下嬰幼兒。積極擴充兒童日托中心，並公告各地托兒費用公定價，並接受生病兒童的托育。東京都認證及社會福祉法人以外的私立認可保育所，須設置營運委員會，以確保營運品質。
- (2)嬰兒托育旅館：車站附近設立嬰兒托育旅館，接受晚上 7 點之後的夜間托育與過夜托育。
- (3)社區家庭支援中心：由縣市政府以會員制的方式，提供臨托、課後托育、

¹ 「新新天使計畫」之全名為「兒童育兒全援計畫」。

接送服務、假日托育等服務，協助父母的日常事務需求。

3. 經濟支持政策

- (1)生育津貼：提供產婦 35 萬日圓一次性津貼(約新台幣 11 萬元)。
- (2)兒童津貼：前一年家庭總收入低於 780 萬日圓（約新臺幣 245 萬元），且子女年齡未滿 12 歲者，前 2 名子女，每月可領 5,000 日圓津貼（約新臺幣 1,575 元），第 3 名子女起，每名每月給予 1 萬日圓（約新臺幣 3,149 元）津貼。
- (3)特別津貼：受僱於公家或私人部門的受僱者，前一年家庭總收入高於 780 萬日圓，但低於 860 萬日圓（約新臺幣 270 萬元）者，前 2 名子女，每月可領 5,000 日圓津貼（約新臺幣 1,575 元），第 3 名子女起，每名每月給予 1 萬日圓（約新臺幣 3,149 元）津貼。
- (4)兒童養育津貼：提供單親之父母及未與父親共同負擔家計之母親養育 18 歲以下子女所設之津貼。家庭前一年總收入低於 204.8 萬日圓（約新臺幣 64.5 萬元）者，養育 1 名子女的家庭每月給予 42,370 日圓津貼（約新臺幣 1.3 萬元）；養育 2 名子女的家庭每月給予 47,370 日圓津貼（約新臺幣 1.5 萬元）；養育 3 名子女以上的家庭，每名子女增加 3,000 日圓津貼（約新臺幣 945 元）。若家庭年收入高於 204.8 萬日圓（約新臺幣 64.5 萬元）但低於 300 萬日圓（約新臺幣 94 萬元）者，每月津貼為 14,020 日圓（約新臺幣 4,415 元）。

四、南韓

(一)總生育率變化情形^[10]

1960 年代初期，南韓因為嬰兒潮出生而人口大幅增加，影響經濟成長，於是採行家庭計畫控制人口，降低人口增加率與總生育率。南韓總生育率由 1960 年 6 人，下降至 1983 年低於 2.1 人，之後便持續低於 OECD 平均總生育率；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，總生育率大致維持於 1.6 人的水準。1997 年因為亞洲金融風暴，總生育率快速下降，至 2005 年降至最低水準 1.08 人，之後轉呈上升，於 2007 年為 1.25 人，2007 年為全球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。2008 年總生育率再轉呈下降，2009 年續降為 1.15 人，隨後維持於 1.2 人上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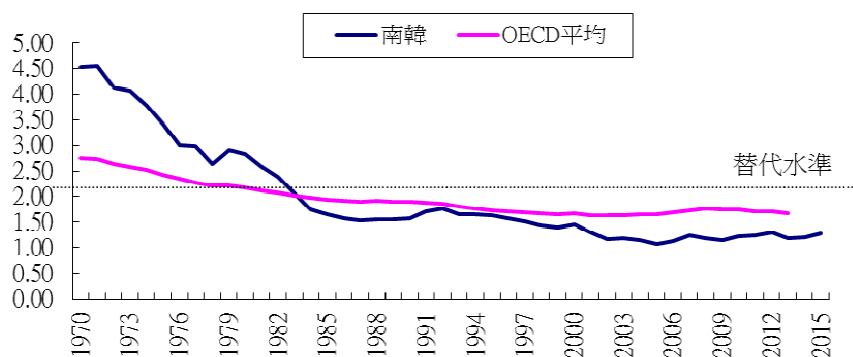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1970-2015 年南韓總生育率變化情形

資料來源：同圖 1。

為因應少子女化問題，南韓於 2005 年制定「低生育、高齡社會基本法」，並設置直屬總統的「低生育、高齡社會委員會」，並於保健福祉部設置「低生育、高齡社會政策本部」，做為政策推動機關。

2006 年決議未來 15 年內，每 5 年訂定一次基本計畫，分別為第 1 期「低出生率、高齡化社會基本計畫」（2006-2010 年），以創造生育與育兒友善環境為主軸，惟其成效似乎不如預期。接著，推出第 2 期 5 年計畫(2011-2015 年)，以逐步恢復總生育率為重點，並規劃透過第 3 期計畫(2016-2020 年)，以提升總生育率至 OECD 國家平均水準為終極目標。

(二)具體育兒支持政策及措施[1][2][9]

1. 友善職場政策

- (1)產假及津貼：提供 90 日產假，生產前後各可以申請 45 日；提供 60 日全薪津貼，30 日視該女性之月薪比例給付；若有 16 周後流產等情事發生，亦應提供。
- (2)育兒假及津貼：滿 8 歲前，可申請最多 1 年；若父母皆就業，則共可取得最長 2 年。
- (3)男性育兒假及津貼：為鼓勵男性申請育兒假，2014 年起針對同一小孩申請第 2 次育兒假者，得支給 1 個月全薪。
- (4)縮短工時及補助：為照顧 8 歲以下孩童，可申請為期 1 年減少 15~30 小時

工作時間，2015 年起，得再延長 1 年，若夫妻輪流申請可至 4 年，並享有 6 成薪之補助。

- (5)提供托育服務或津貼：企業單獨或共同在職場設置保育所，或與地區（社區）保育所簽訂委託契約；若無法於職場設置企托者，須發給員工保育津貼，不履行者，公告官網。

2. 教保環境政策

- (1)充足保育措施：增設托育中心等保育措施，並提高其使用率。

(2)提高保育服務品質：2012 年起，規定所有保育設施須義務設置營運委員會，並建立保育設施的評估認證制度，另採行保育費電子卡結算制，提升使用便利度。

3. 經濟支持政策

- (1)地方政府發放「生產祝賀金」。

(2)育兒津貼：依孩子年齡，每月給付 100~200 美元(約新台幣 3,100 元至 6,200 元)。

(3)家庭補助津貼：提供 3 歲以下幼兒家庭，每月給付約 500 美元(約新台幣 15,500 元)。

(4)送托公立托育設施者，其托育費用免費；送托私立托育設施者，在相當於公立設施保育費標準額度內免費，差額由家長負擔。

肆、主要國家育兒支持政策對我國之啟示

經觀察法國、瑞典、日本及南韓歷年總生育率變化，以及各該國育兒支持政策內容後，對我國的啟示有：

一、提升生育率相關政策需長期推動

我國總生育率於 1984 年跌破人口替代水準 2.1 人，2010 年總生育率創下歷史新低點 0.895 人後，政府已將少子化視為國安問題，積極推動各項提升生育率政策，近年總生育率已有回升，惟我國目前總生育率未超過 1.3 人，仍陷超低生育率的困境中。

然而，觀察法國與瑞典 1970 年至 2015 年總生育率變化發現，歷經過近 20

年政府積極投入資源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，才逐漸促使民眾願意生養。日本之總生育率略有波動，亦經過約 10 年的努力，其總生育率始趨穩定。因此，我國仍須持續努力建構友善生養環境，長期鼓勵國人生育，促成總生育率之提升。

二、鼓勵生育需有整套(package)策略

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歷次「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」結果顯示，影響 15 至 49 歲有偶(同居)想(再)生育女性生育意願，包括：提供托育費用補助、育兒或教育津貼、教養支出稅賦減免、鼓勵生育工作環境、家人分攤家務及育兒工作等[8]。

法國、瑞典、日本及南韓均非透過單一措施達到提升生育率效果，而是藉由建立友善職場、營造完善教保環境及提供經濟支持等多管齊下策略，使民眾有多元育兒方式，可兼顧工作與育兒。

由上可知，鼓勵生育需有整合性的家庭政策，從照顧教養環境、職場環境、經濟支持、家庭教育及性別平權等面向規劃，提供家庭發展完整的資源與服務，始可因應人口結構變遷及國家社會未來發展趨勢。

三、性別平等政策需為家庭政策之基石

依據相關研究顯示，性別平等表現較佳的國家，總生育率越高，然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 年性別統計資料顯示，我國婦女的性別處境排名為全世界第 4 名，總生育率在 2011 年時，是世界前 20 名 GII(Gender Inequality Index)指標得分國家中最低的[9]。究其因，性別平等與總生育率成正向關係之國家，是將性平的概念同時落實於公領域(職場)與私領域(家庭)，而我國較缺乏家庭內之性別平等。

復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「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」，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曾因生育(懷孕)而離職之原因觀察，以「照顧子女」最高，達 70.60%[8]，顯示我國仍認為照顧孩童者為女性，尤其在亞洲國家普遍存有此刻板觀念。觀察日本與南韓為扭轉女性為主要照顧者之觀念，目前以鼓勵的方式，透過育嬰假及津貼，誘導男性參與育兒工作；然而，瑞典以限定父親育兒假不得轉讓之規定，傳達父母應共同擔負育兒責任之觀念。我國現行規定父母皆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然限於我國男女就任同一職務薪資仍有差異及價值觀念等因素，實際上歷年女性申請者均占 8 成以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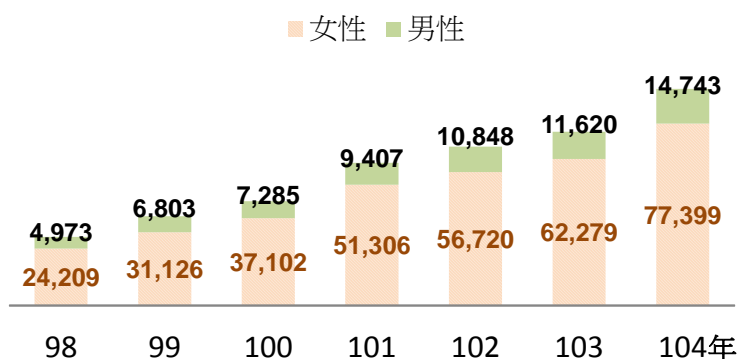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98 年至 104 年社會保險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性別統計

資料來源：勞工保險局-就業保險，取自 <http://www.bli.gov.tw/sub.aspx?a=XtUbjKgHLVM%3d>；臺灣銀行-公教人員保險，取自 <http://www.bot.com.tw/GESSI/Pages/default.aspx>；臺銀人壽-軍人保險，取自 <http://www.twfhclife.com.tw/documents/miinsurance2.htm>

四、建構完善生養環境需投入資源

媒體總是報導北歐國家享有優厚的育兒支持或福利，然而卻忽略在享受該福利時，是建構在繳納較高的稅賦責任上，若國家無財源，便無法提供人民優渥的福利措施。

依據表 2 所示，近年我國賦稅負擔率雖有逐漸增加情形，惟相較其他主要國家仍低，因此在有限的資源下，政府須思考如何發揮現有資源之最大效益，且更要穩定及開發財源，以長期推動育兒相關政策，建構完善生養環境。反之，太早懷孕或非預期懷孕，特別是未滿 20 歲的小媽媽，發生周產期死亡、出生體重過輕、早產的風險皆會增加，也會影響母體及寶寶的健康。國民健康署特別提醒，為了下一代的健康，在適當的年齡結婚及生育才是最符合健康的原則。

表 2：主要國家 2013-2015 年賦稅負擔率(不含社會安全捐)

(單位：%)

| 年 \ 國家 | 中華民國 | 日本 | 南韓 | 法國 | 瑞典 |
|-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2013 | 12 | 17.9 | 17.9 | 28.3 | 32.9 |
| 2014 | 12.3 | -- | 18 | 28.2 | 32.8 |
| 2015 | 12.8 | -- | -- | -- | -- |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，取自

<http://web02.mof.gov.tw/njswww/WebProxy.aspx?sys=100&funid=defjsp2> (瀏覽日期：2016-04-28)

參考文獻 |

- [1] 王麗容、陳玉華(2014)，「性別平等政策對於生育率影響之跨國研究」委託研究，台北：行政院。
- [2] 熊彬彬(2013)，法國與瑞典十八至二十世紀初人口初探，2014 年台灣人口學會學術研討會文集，臺北：國立台灣大學。
- [3] 林國榮等（2012），臺北市市民婚姻與生育需求評估及整合性婚育政策。臺北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。
- [4] 日本一獨立行政法人統計中心，取自：<http://www.nstac.go.jp/about/index.html>
- [5] 日本一內閣府，取自：<http://www.cao.go.jp/>
- [6] 行政院主計總處-「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」，取自：<http://www.stat.gov.tw/public/Attachment/531293127198HDYFK.pdf>
- [7] 行政院主計總處-國情統計通報第 105 號，取自：<http://www.dgbas.gov.tw/public/Data/366166371.pdf>
- [8]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: The 2015 Revision, United Nations, New York. From <http://esa.un.org/unpd/wpp/>
- [9] Carmen Heurta (2011).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, OECD, Paris. From http://www.keepeek.com/Digital-Asset-Management/oecd/social-issues-migration-health/doing-better-for-children_9789264059344-en#V_CJL_SGOWw#page19
- [10] OECD Family database，from <http://www.oecd.org/social/family/database.htm>